

宋代蜀刻《经进详注韩文》 与《百家注柳文》

陈 杏 珍

《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》四十卷，《外集》十卷，《遗文》三卷，唐韩愈撰，宋文说注，宋王俦补注；附《韩文公志》三卷。本书为南宋蜀刻本，版框高21.2厘米，宽14.3厘米。每半叶十行，行十八字，注文双行，行字同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目录和卷一前题下署注释人姓名，题“迪功郎普慈文说词源详注 通直郎致仕淡斋王俦尚友补注”。书中避北宋讳，但不很严格，南宋讳不缺笔。原缺卷十二至十八，前人据南宋池州刻白文本配补。配本每半叶十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全书有少量抄配叶。

看本书的字体刀法，初步可定为南宋中期四川刻本。两位注释人，都是四川籍，文说字词源，普慈（今四川乐至）人；王俦字尚友，武信（今四川遂宁）人。卷首有绍兴己巳年（1149）文说序和乾道二年（1166）文说进书表，指明了详注韩文的时代。版心下端镌刻有刻工姓名，为鉴定版本提供了可靠的依据。计有张昌、李正、杨定、张德先、史丙、王公济、王龟、田正二、文望之、文来、单回、姚明、单全、杨先、单太、单定、杨炳、吕洞、王胜、张已孙、单召、吕道、宋正、宋真、王承、马行等。这些刻工在镌刻自己的姓名时，真书、行书、草书各体字并用，阴文、阳文并用。有时刻写完整的姓名，并且精雕细刻，在姓名上面还加个鱼尾；有时草率从事，署名不完整，只从姓名中抽取一、二个字镌刻，并且随意简化字体，或仅勾画一个符号作标

志。书中多次出现“史丙”这一刻工姓名，有一处刻作“眉史丙”，联想到古人称谓习惯和四川刻本的特点，可以判断，这个“眉”字，当指四川眉山。例如北京图书馆所藏宋眉山刻本《淮海先生閒居集》，卷一首叶版心下端就刻着“眉山文中刊”五字。又如宋庆元五年（1199）成都府学刻本《太平御览》，版心下端镌有刻工“成都杜俊”。书中保留了标识版刻年代和版刻地点的完整文字，也保留了大量的刻工姓名，其中也有单回、张昌、王龟、宋正等刻工姓名，也是真书、行书、草书各体字并用，阴文、阳文并用，规范字与随意缺笔少画的简体字并用，刻工姓名上面有时也雕个鱼尾。由此可以判断，文说经进详注本韩文，与这部《太平御览》的版刻时间、地点大致相同，应是南宋中期成都眉山地区刻本。

书中配补的七卷白文本《昌黎先生集》，观字体刀法，疑为宋代池州刻本。这七卷的版心下端的刻工姓名，有王寿、王亨、斯从文、王辰、潘晖、夏旺、曹胜、蔡胜、刘通、朱佺、蔡正、田原、田良、金通等，还有不少单字刻工名。山西省祁县图书馆藏宋刻《昌黎先生集考异》十卷，现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。此书卷一前题下有序，谓韩集“今世本多不同，惟近岁南安军所刊方氏校定本号为精善，别有《举正》十卷，论其所以去取之意”；“今辄因其书更为校定，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它书之可证验者决之。苟是矣，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；有所未安，则虽官本、古本、石本不敢信。又各详著其所以然者，以为《考异》十卷，庶几去取之未善者，览者得以参伍而笔削焉。”卷后有绍定己丑（二年，1229）朱熹的学生张洽的识语，谓：“晦翁先生因方氏《举正》之书，取而评论，其未合者，使一归于是……可谓详密无遗憾矣……独此书先生末年所著，未有善本。洽通守池阳，初欲刻之泮宫，已而不果，乃以本听币馀命工刊刻，庾使赵侯范继其费，益以属邑学帑之助，并刊

《考异》于后。”说明此书是绍定二年张洽任池阳通判时所刻，张洽先刻朱熹校定的韩文，又刻《考异》十卷，置于韩集全书之后，不象后来的重编本，将《考异》分散，附于韩文的章句之下。在此宋刻《昌黎先生集考异》十卷中，版心也有许多刻工姓名，如潘晖、金通、蒋正、王寿、王亨、夏旺、叶必先、李全、金合、从文等，与文说详注本韩文中所配补的《昌黎先生集》的刻工姓名大致吻合。且《考异》与这配补本行格相同，字体刀法相同，版框大小相同，书中也有“乾学”、“徐健庵”等藏印。联想到配补本的各卷前题，除抄配叶外，也作“昌黎先生集”，与《考异》的书名一致，因而推知，这个配补本，就是绍定二年张洽在池阳所刻，与《昌黎先生集考异》是同一部书的两个组成部分。

韩愈文集，最通行的注本是明代东吴徐氏东雅堂刻本。这部书的注解，采自宋末廖莹中世綵堂刻本，而廖注主要依据南宋魏仲举的五百家注本，并删节朱熹的《考异》，散入各条之下。其书保存了不少原书已失传的唐宋旧说，但遴选不够精当，文义多乖，读者病之。五百家注韩文还有一个突出的不足之处：与所谓千家注杜诗、五百家注柳文一样，其号称五百家，不过是虚夸之数，不仅数量远远不足，而且也难免漏略当时重要的注家。如文说、王俦的名字，就不见于五百家中。文、王二人注释韩集，花费了长期艰苦的劳动，功绩斐然。经进本韩文卷前有殿中侍御史杜莘老《详注韩文引》，云：“……今文说者，尊崇山斗，力于赵德、李汉，尽搜经史百家之书，详为之注，考定年月，系于其文之首。其中质疑阙，发隐秘，章分句断，以闢西墙，俾读之者焕然在目。”由于该注本流行极少，还没有引起世人的重视。经进详注本韩文未见有复本，也没有翻刻本。原书缺佚七卷，令人惋惜，可喜的是配补本也是罕见之本，自可与经进详注本并传不朽。

书中钤有“崑山徐氏家藏”、“乾学之印”、“健庵”三印记，因知此书曾为清初徐乾学收藏。清中叶以后，转归汪士钟所有，书中钤有“汪士钟臧”、“长洲汪骏昌臧”、“骏昌”、“雅庭”等汪家印记。书由汪家散出后，又归杨氏海源阁。钤有“杨以增字益之，又字至堂，晚号冬樵”、“杨以增印”、“至堂”、“东郡杨氏鉴藏金石书画印”、“东郡杨氏宋存书室珍藏”、“宋存书室”、“杨绍和审定”、“彦合珍藏”、“绍和筑岩”、“杨绍和臧书”、“东郡杨二”、“东郡杨二鉴藏金石书画印”、“杨保彝藏本”、“关西节度系关西”、“瀛海仙班”等。杨氏虽入藏了此书，但《楹书隅录》却没有著录。之后，本书归北京图书馆收藏。

《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》四十五卷，唐柳宗元撰，宋童宗说、韩醇等注释。南宋蜀刻本。框高21厘米，宽14.3厘米。每半叶十行，行十八字，注文双行，行字同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书中避北宋讳，但不很严格，南宋讳不缺笔。全书有少量抄配叶，有刻藏印处。

书中有“新刊百家音辨诂训柳文诸儒名氏”，共列注释者姓氏101人，其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姓氏，即前文介绍的南宋中期成都眉山地区刻本《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》的注者文说及补注者王俦。韩、柳集的注本，影响较大的是五百家注本，但无论是五百家注韩文还是五百家注柳文，所开列的注释人姓氏中，都未见文说、王俦的名字，只有在经进详注韩文和百家注柳文中，才同时见到文说、王俦的姓名和他们的注释，说明这两部注本的产生是有一定联系的。经进详注韩文标题下注文低三格，“详注”无特殊标志，而补注内容则用阴文圈出“补注”二字作提示。该书卷一前题作“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卷第一”，下书“补注附”三小字，但部分卷次的前题却作“新刊经进详补注昌黎先生

文卷第×”，目录前题中也作“详补注”。而百家注本柳文，大约因注家众多的缘故，为明确区分各家之注，不仅有姓氏的用阴文圈出“童曰”、“孙曰”等，而且无姓氏的也用阴文圈出“详注”、“补注”，其标识方式与经进详注韩文相同。百家注柳文的前题也与经进详注韩文相类似，或题“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卷第×”，或题“新刊增广百注音辩唐柳先生文卷第×”。

这两部文集，版框大小一致，版式相同，行格相同，字体刀法也相似，从版刻上可以判断，两书是同时并出的。两书的版心下端都镌刻着大量的刻工姓名。百家注柳文的刻工有张昌、赵永先、张福孙、姚明、张午、田友直、文望之、赵正、程汉、史丙、马行、文来、田乙、张越、杨山、李正、张寄、张梅等人。这些刻工在镌刻自己的姓名时，真行草各体字并用，阴文阳文并用，有时刻写完整的姓名，并且精雕细刻，还在姓名上面加个花鱼尾，有时只从姓名中抽取一、二个字镌刻，并且随意简化字体，以至胡乱勾画一个符号，而经进详注本韩文也有上述现象，版心留名的，也有张昌、李正、史丙、文来、姚明、文望之、马行等刻工。两书刻工相同，版刻风格相同，足以证明两书是同一时代、同一地区所刻，它们具体的出版时间可能有先后，但相去不会很久。由此可以断定，百家注柳文和经进详注韩文一样，也是南宋中期成都眉山地区刻本。

据文献记载，宋代成都眉山地区曾系统地刻印大量的唐人文集，可惜在兵火中丧失殆尽。幸存传世的蜀刻唐人文集大体上可分为两个系统，一为十一行二十字本，今存《骆宾王文集》、《李太白文集》和《王摩诘文集》；一为十二行二十一字本，今存《孟浩然诗集》、《刘文房集》、《孟东野文集》、《新刊权载之文集》、《昌黎先生文集》、《张文昌文集》、《刘梦得文集》、《欧阳行周文集》、《姚少监诗集》、《新刊元微之文

集》、《皇甫持正文集》、《李长吉文集》、《许用晦文集》、《张承吉集》、《孙可之文集》、《司空表圣文集》以及《郑守愚文集》，其中好几种已残缺。这两个系统的唐人文集，编次往往不同于别处刻本，且版刻精美，故人们将它们并称，视为宋代蜀刻本的代表。经进详注本韩文和百家详注本柳文的发现，扩大了人们的视野，得知宋代蜀刻唐人文集，除了上述两种版本系统外，还有十行十八字的宋代蜀刻韩柳文注释本传世。百家注柳文卷帙完整，镂版精致，字画遒劲，纸墨莹洁，是宋代蜀刻本中的精品，与经进详注韩文堪称蜀本双璧。宋代刻印的柳集，流传至今的很少，幸而流传下来的，其中有好几部已残缺不全。百家注柳文是现存柳集中时代较早的注本，在编次、注释、文字校勘上自成一体，足资校勘研究之用。书中保存了许多他书不载的资料，有些注释人的姓名连同他们的著作早已湮没不闻，仅赖此书得以传播。故该书的版本价值不容低估。

据《楹书隅录》著录，本书应是清初崑山徐乾学的藏书，杨绍和云：“往于江南获百家注本，乃传是楼故物。”（《楹书隅录·宋刊添注重校音辨唐柳先生文集》）但本书中未见有传是楼藏印，查清代刘氏味经书屋抄本《传是楼宋元板书目》和《传是楼书目》，均未著录百家注本柳集。

书中钤有“汪士钟印”、“闽源真赏”二印记，得知本书曾被清朝长洲著名藏书家汪士钟收藏，以后转归杨氏海源阁。书中杨氏藏印累累，如“杨以增字益之，又字至堂，晚号冬樵，行式”、“益之”、“以增之印”、“杨氏伯子”、“杨东樵读过”、“东郡杨氏海源阁珍藏”、“墓田丙舍退思庐主人记”、“关西节度系关西”、“四经四史之斋”、“禄易书，千万值，小胥抄，良友诒，阁主人，清白吏，读曾经，学何事，愧蠹鱼，未食字，遗子孙，承此志”、“仪晋观堂”、“仪晋观堂鉴藏甲品”、“先都御史公遗藏金石书画印”、“东郡杨绍和字彦合藏

书之印”、“协卿珍赏”、“东郡杨绍和鉴藏金石书画印”、“协卿读过”、“杨绍和读过”、“东郡杨氏宋存书室珍藏”、“杨氏协卿平生真赏”、“绍和筑岩”、“杨彦合读书印”、“东郡杨绍和印”、“杨二协卿”、“聊摄杨氏宋存书室珍藏”、“杨保彝藏本”等。这些藏印，对研究海源阁藏书有助。继杨氏之后，此书又归刘占洪先生收藏，书中钤有“东莱刘占洪字少山藏书之印”、“少山”、“刘占洪”等印记。解放后，刘占洪先生将此书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入藏至今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

明万历以前无娶妓为妾说

偶读丁闢公《明事杂咏》（民国十五年中华书局刊本）中一首七言绝句并一段文字，其中提及明万历以前无娶妓为妾事，觉得此说对研究《金瓶梅词话》的成书很有用处，兹录如下：

清流原不讳风情，拾翠题红遍两京；移入锦屏无此例，开山第一许霞城。谭仲木谓，明万历以前士大夫无娶妓为妾事，自许霞城娶王修征始开此例。

文中许霞城、王修征及谭仲木，尚不知为何许人，但就文字所述，此说似言有所据。若确乎如此，那它无疑是《金瓶梅词话》创作于明万历朝的一条佐证。考明以前的宋元时代娶妓为妾事较为常见，这在诸多笔记杂说中屡有述及；而明改元后就不然了，从明初至隆庆间，的确还没有见到过此类记述。虽“大明律有官吏挟妓饮酒之条，然宣德三杨公犹及用之”（见《青泥莲花记》卷12），但也仅限于饮宴而已。元末孔齐的《至正直记》卷2说：“以妓为妾，人家之大不祥也。……未有以妓为妾而不败者。”这是否就是明初至隆庆间其风不行的原因，而至万历时才时风大变了呢？

• 郑平昆 •